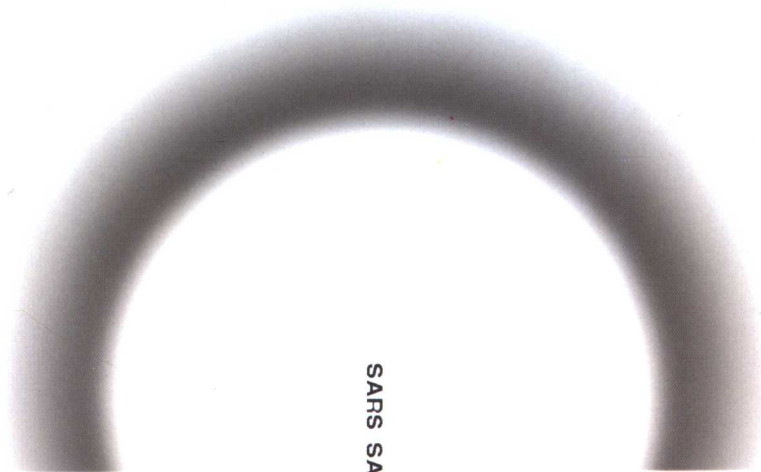


sars 与中国社会

SARS YU ZHONGGUO SHEHUI

■上海大学《SARS与中国社会》课题组



SARS SARS SARS SARS SARS SARS SARS SARS SARS SARS SARS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SARS 与中国社会

上海大学《SARS 与中国社会》课题组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· 上海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SARS与中国社会/邓伟志等著. — 上海: 上海
大学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-81058-633-5

I.S... II.邓... III.重症呼吸综合症—社会影响
—研究—中国 IV.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01207号

SARS与中国社会

上海大学《SARS与中国社会》课题组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 200436)

(E-mail: sdcbs@citiz.net 发行热线 66136010)

出版人: 姚铁军

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90 X 1240 1/32 印张 12 字数 307000

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2100

定价: 20.00元

序

上海大学党委书记、常务副校长 方明伦

2003年5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,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禁令并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除名。至此,我们可说中国防治SARS战役在第一战场上已获决定性胜利,这个胜利值得我们庆贺。但是,我们不能忘记,中国抗SARS战役实际上有三个战场,另两个战场分别是防治SARS科技攻关战场和反思SARS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战场。抗SARS战役的最后胜利取决于对SARS的科技攻关,如SARS疫苗的研制成功,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此次抗SARS战役中汲取教训,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进行理论反思,从社会观念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对防治SARS战役进行经验总结,进而对我们的社会文化结构作出合理调整。可以说,对SARS的研究,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者不可偏废。

我校科研处深入动员、广泛发动,并紧急启动了《SARS与中国社会》课题组,在较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一支高效率的研究团队,以合作攻关课题组的形式分别从社会、经济、法律、政治、新闻传播等不同角度对SARS这一突发性灾害事件展开分析和讨论,最终形成系列论文并结集出版,这一成果值得肯定。从这一成果中我们高兴地看到,经过近年的大力建设,以硕士点的合理布局为依托,以博士点的建设为龙头,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非常活跃,具有一定国际国内知名度、学科结构科学、年龄梯队合理的文科科研骨干队伍。

当然,本书还只是我们对SARS问题的初步研究成果,这是研究的起步而不是研究的结束。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





SARS

与中国社会

的作用,希望我们的研究能为国际国内学术界进一步思考 SARS 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点,希望以此为我国的抗 SARS 战役作一点微薄的贡献。

目 录

序	方明伦	1
● 社会篇		
对 SARS 的社会学思考	邓伟志	3
SARS 是什么病?	王晓明	5
SARS 事件与公共领域	葛红兵	11
SARS 事件中的政府、社会和公民	章友德	17
SARS 与人类可持续发展	张敦福	32
SARS 危机呼唤新的社会保障机制	路学仁	42
从 SARS 事件看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紧迫性	樊天霞 徐鼎亚	54
SARS 事件中的社会动员与志愿服务	俞海薇	65
● 经济篇		
SARS 的一个经济学侧视	陈 宪	75
从 SARS 事件看危机管理的对策	陈祝平	96
SARS 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	王文华 谢远世	104
SARS 事件的负面效应和正面效应	徐 瑾	111
SARS 防治的博弈模型和最优策略	王惠萍	116
SARS 与生态经济	张雅丽	125
● 法律篇		
审理涉 SARS 刑事案件的法律保障 ——两高办理涉 SARS 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解读		



.....	严 励	139
SARS 防治的法律思考		
——浅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与《应急条例》	李 惠	148
SARS 与公民知情权	王兴和	155
SARS 与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	汤啸天	162
商业利益与公众健康的利益平衡		
——以与 SARS 相关的专利权为个案分析	袁真富	173
SARS 与微生物及其基因的专利法保护	杨望远	185
SARS 时期的犯罪与防控	岳 平	191
紧急状态下人权的法律保护	朱朝晖	197
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的建议		
.....	任青萍	205
“后 SARS”时期对医患纠纷的重新思考	王 琳	212
● 政治篇		
SARS 事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	程竹汝 杜莲梅	225
对于社会谣言的哲学审视		
——由 SARS 时期社会谣言引起的反思	陈新汉	234
SARS 危机与反谣机制	夏 耕	248
SARS 时期政府公共职能的特殊性	叶 景	256
应对突发事件还需架构良好机制	吴德勤 周玉燕	263
行政干预预防 SARS 商品市场的必要性和合规性思考		
.....	饶年华	272
SARS 与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众认同	顾晓英	278
弘扬抗击 SARS 的伟大精神	沈鸿新	285
在抗击 SARS 中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	黄燕清	291
● 新闻传播篇		
SARS 事件中传媒组织的功能	宗明 顾均慧	299
SARS 报道与新闻客观性	戴元光等	312

SARS时期中国部分主流媒体内容分析

- 以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云南日报》、
《羊城晚报》为例 戴元光等 325

社 会 篇

对 SARS 的社会学思考

邓伟志

那些日子,我跟大家一样忧心如焚。但是,作为社会学爱好者,我更多的是忧心思远,对 SARS 作社会学的思考。

SARS 是疫之一种。疫,同水、旱、震、风一样,都是灾。不过,这种灾又同水、旱、震、风不一样。水、旱、震、风等灾,均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。而疫,从病毒来讲,是自然界。可疫的这种自然,是人身上的自然,是生理人与社会人集于一身。因此对疫的战斗必然包含更多的社会因素。SARS 正在引发出一大堆社会问题,唤起人们思考。我们应当拿出当年抗洪的精神来战胜 SARS,同时也应当看到战胜 SARS 比战胜洪水更为艰巨,换句话说,战胜 SARS 需要用更多的社会学理论“药方”。

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,就是患者与他人的互动。“互动”通常是好事,可在这里就成了交叉感染,成了坏事。社会学早就把“感染”移植成为学术术语,叫“社会感染”。为了避免感染和社会感染,我在思考一个问题:是把患者分散在各地治疗好,还是集中在一个地方,比如说在一个岛上治疗好?值得从长计议。请注意这里的“长”字。

其次,要研究灾度与心理的关系。灾度大小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刺激强度不一样。一般说,是有线性关系的:灾度小,人心定;灾度大,人心慌。对 SARS 患者需要找到特效药治疗;对健康者,包括不健康的,甚至患别种病的人,需要的是心理治疗。这种心理治疗一定要是科学的,而不是生硬的。

第三,要研究 SARS 与社会化、社会流动的关系。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。社会既有垂直流动,又有水平流动。如今是全球大流动,是全球化。全球化的好处是资源配置更合理,是有福同享。可是,任何



事情都有二重性。有了有福同享,必有有难同当。这次的 SARS 分布三十多个国家,几乎是全球性的。一般说,开放度大的,社会流动频率高的,SARS 蔓延严重。这就要求我们有“两点论”。不止不行,不行不止。为防疫,应减慢社会流动的流速;暂时减慢社会流动是为了将来更好流动,切莫因噎废食。另外,SARS 的这种跨国性恰好有助于对灾害的比较研究,从而推动灾害学的发展。

“敌存灭祸,敌去招过”。灾害社会学告诉我们:要辩证地看待灾果。在每一大的自然灾害面前,人心不齐的会变齐,人品不高的会变高。在这次 SARS 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为,就很值得我们反复回味。像今天这样深受欢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,今后如何推广开来,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? SARS 迫使我们精简了不少会议。SARS 过后,能不能总结 SARS 时期的工作经验,把会议减少到尽可能少的程度? 这些天公款吃喝少了。长期以来,几百个文件没堵住官员的一张嘴,现在一个口罩就堵住了。今后能不能把公款吃喝也减少到 SARS 发生期的地步? 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半年不吃肉。现在每年公款吃喝几百亿元。我们从现在起,是否能开始把从筷子、叉子底下省出的钱,用来弥补 SARS 带来的损失? SARS 还在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:社会交往少了,家庭团聚多了,SARS 过去以后又会怎么样? 注意清洁了,洁癖也出现了,今后会怎么样呢? 人们见面作揖了,不握手了,今后呢?

从根本上说,任何一种灾,都有孕育期、发生期、消亡期三个阶段。但愿中国的 SARS 能够开始从发生期向消亡期转化,进一步降低灾度,缩短灾时,缩小灾域,化灾为利。

(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,博导。

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)

SARS 是什么病？

王晓明

人类社会中没有“自然”的事情。40年前，中国的媒体所以会异口同声地称呼三年大饥荒为“自然灾害”，就恰恰显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一种特别的政治文化。这一次的 SARS 事件也是如此：即便这病毒是来自天外，既非广东人吃野物吃出来的，也非国际阴谋战略制造出来的，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弥漫大江南北，还远渡重洋、繁殖于欧美各地，就还是极为触目地凸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象。当然不止是病象，还有疗救的坚决的意志，也不止是中国的，还有其他国度、甚至整个人类的病象，但是，身为中国人，我首先看到的还是自己社会的病象，是一系列来自制度、也来自精神的病象。

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。倘是在农村，尤其偏远的农村，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，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：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，是小事。而在大城市里，一种传染病来了，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，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。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，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，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，多几分免疫的可能。人数上，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，可决定对策的，却总是那站得比较高、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，每当有什么灾难（它通常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层者的头上）突然发生了，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，就是否认、推诿、封锁消息、瞒下哄上，好像一承认了灾难，自己就要吃亏，越是把事情捂住，自己越占了便宜。当然，眼光比较远大，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，住在城里的高阶层者当中，也不乏能超越私利、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物。但是，恕我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、



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的消息的人,总是更容易滋生吧。马克思说“存在决定意识”,俗话亦云“屁股指挥脑袋”,广东那一位声色俱厉地斥斥“谣言”的卫生厅长,还有中央那一位当众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,他们所以会这么做,恐怕主要就是因为,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“屁股”出发的逻辑。

更令人不安的是,这种一切唯“屁股”是瞻、只以“位置”来区别人我的逻辑,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。当 SARS 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,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,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,也多是漠然置之(我自己就是例子)。原因很简单,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:那是在广东,与我有何相干? 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,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,什么地方“毒米”吃死了人,这一类“地方性”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,可别处的人民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? 知识分子中间,又有多少人(不是没有人)为这些事情持续地深思、奋力地叫喊过? 一直要到 SARS 在北京也爆发了,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:原来 SARS 不像矿井里的瓦斯爆炸,轰隆一声就完了,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、四处蔓延,无论城乡还是官民,它都一体对待,谁都不给豁免权。于是紧急动员,于是群情激愤,于是有人呐喊,于是有人丢官……似乎一夜之间,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。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。它的背后,也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。但同时,你是不是会感觉到,那一切从“屁股”出发的逻辑,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? 毕竟,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: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,中央空调的写字楼,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。一旦这样来看,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:那先前的漠然置之,和现在的群情激愤,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“病原体”——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。什么是制度的病? 这就是。

SARS 是如此刁钻,越是那些“现代化”、“与世界接轨”的标志物:高楼林立的大都市、四通八达的交通网、中央空调的饭店、旅馆、商场、写字楼……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。看清楚 SARS 是这样的一种“现代”病,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一百八十度急转弯:关闭

空调、堵截交通、取消社交、以邻为壑。门卫只对熟人放行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，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。谁能想到，在 21 世纪，老子式的“小国寡民”又成了救世之道！然而，那些居住在疫区的人，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“小国之民”。本地的疫情越凶猛，他们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跑：先是北京，接着是上海。原因很简单，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，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，那里诊治 SARS 是免费的，就是口罩，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……据说，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；目前，也正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。可以想象，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省会上演，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。

从防治 SARS 的大局来看，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只有每个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动，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够减到最小。可是，你是否想到过，当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，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。要让人安心于“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，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、器械锃亮、医生成群，我这边却窗歪门斜、缺人少物，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？一个社会，如果平时忽视公正、贫富悬殊，那到了危难时刻，就很难指望公众（无论贫富——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）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。最近 20 年来，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确有进步，至少许多地区（特别是大中城市）的人民的物质生活，以所谓“现代化”的标准看，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。但是，在另外的一些方面，社会的倾斜也逐渐加重，沿海和内地、城市和乡村、上层和底层、新富人和新穷人……彼此的差异的扩大，真是相当惊人。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，但看看近几年的不少行政决策：教育收费、乡镇“事业费”摊派、城市房价促涨、汽车和火车票提价……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“损不足以富有余”的警告。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体系的年久失修，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、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人医院：这样的事情，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？而且，也一定不止是表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。你是不是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制度的病？

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：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，并不都



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,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,不是有权,就是有钱,单是内蒙古的一个县,不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?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,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,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?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样,真正的底层人民,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。危难时刻见人心,这些丢开职责、撒腿就逃的官员,这些打了退烧针、混上飞机的有钱人,其实是和那些“瞒和骗”的官员一起,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病,推到了你我的眼前:今天,社会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?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、上层人物为“精英”,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期望: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,也是一些最有能力、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。在今天,这样的期望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,一位相熟的美国人就曾对我说:“在美国,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!”尽管如此,这一次 SARS 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“精英”的颀预和冷酷,还是令我非常惊讶。或者是反应迟钝、判断失误,导致疫情迅速扩散;或者是知识老旧、刚愎自用,别人明明查出了 SARS 的病原体,他们还固执己见、误导舆论;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,北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,套话连篇、答非所问,让人着实替他脸红:就是存心打官腔,也不必如此笨拙吧。无数普通的医生、护士、清洁工、警察和建筑工人,都在力战 SARS,奉献出时间、汗水、亲情,甚至健康和生命,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,各类“成功人士”的反应之冷淡、出手之吝啬,更从另一个层面,将这些“精英”的金玉败絮、徒有其表,暴露得非常触目了。

问题是: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?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,就是教育再糟糕,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,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:行政官员的晋升、市场竞争的规则、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,能不能拔优汰劣,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。一个社会的走向,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,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,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。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,都只是在揣摩风向、尔虞我诈、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,其他一概智弱,那就可以预料,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

远。150年前,龚自珍就是从人才的匮乏,觉出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命运;100年前,章太炎更由封疆大吏的才质的一代不如一代,断言社会的崩溃不可避免。我当然愿意相信,今天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,譬如到目前为止,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,都在 SARS 面前手足失措。但是,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,还是在 SARS 蔓延的映照下,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: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。

有许多事情,也和人心有关。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,之所以不管不顾,一逃了之,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、对他人的道义职责。在上海,许多中上层的居民,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,却不自知,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“自私自利”,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,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,足以惊人。从 SARS 爆发到现在,不到半年,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,实在太多了。

仔细想想,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。最近 20 年来,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,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。“告别”革命、“躲避”崇高,经济第一、GDP 崇拜,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!”“良心值几个钱?”……这些理论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,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:只有那些看得见、摸得着,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,才被认为是真实的,是重要的,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:情感、思想、艺术、伦理、学术,乃至医疗卫生、教育、生态平衡、公众的信任程度,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。可不要小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,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。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(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),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(尽管嘴上还要说:“我们是朋友啦……”),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,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。可是,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,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。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,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,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,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。说到究竟,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视的事物,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,这一次的 SARS 的蔓延,就再次证实了这一